

《资本论》中关于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思想阐释(上)

程富富 段学慧

引言

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这个“幽灵”自一百多年前诞生之日起,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最高纲领。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从十月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欧亚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从积弱积贫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实践。历史的轨迹已经表明,共产主义已不再是“幽灵”,而是高高飘扬的旗帜。

如果说《共产党宣言》宣告了科学共产主义的诞生,那么《资本论》则标志着科学共产主义的成熟;如果说《共产党宣言》第一次系统阐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那么《资本论》则以无懈可击、无可辩驳的经济事实和剩余价值理论论证了共产主义原理的科学性。自从有了《资本论》,共产主义就不再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简单结论,更不是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攻击的历史进步主义的简单推论,而是把唯物史观运用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中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而《资本论》正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完美结合与运用,“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

《资本论》是马克思一生的巅峰巨著,在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它作为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既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具体运用,又是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著作。马克思坚决拒绝社会学空想主义那样,从公平、正义等抽象性原则出发来批判资本主义,并在此基础上构想未来的理性王国。

《资本论》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石,以剩余价值论为核心,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把对未来社会的科学研究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严格解剖和分析批判基础上,发现和构建了共产主义新世界。它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了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种种物质因素,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运动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必然性,赋予了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并最终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和思想武器。

《资本论》不仅在对资本主义的剖析中把共产主义奠定在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而且预示了未来社会的一系列特征。然而,在《资本论》刚刚问世时,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孔德的信徒叶·瓦·德罗贝尔蒂指责马克思“只限批判地分析既成事实,而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果真如此?本文的任务就在于系统梳理《资本论》给未来社会开出了怎样的“调味单”。

对于从《资本论》中发掘共产主义的经济形态,一些学者从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以及共产主义的所有制、收入分配、再生产、经济管理和经济核算、教育等方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梳理和阐述,富于启发。但从系统性看,还没有

《资本论》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的基础上,预示了未来社会的经济形态。本文从十三个方面梳理了《资本论》中关于未来社会经济特征的思想,主要从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和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产品生产和交换方式、经济计划和按比例发展等方面研究共产主义的经济特征,并联系现实进行阐释。

把《资本论》中关于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完整内容展示出来。本文以《资本论》第一、二、三、四卷为蓝本,系统梳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研究,以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的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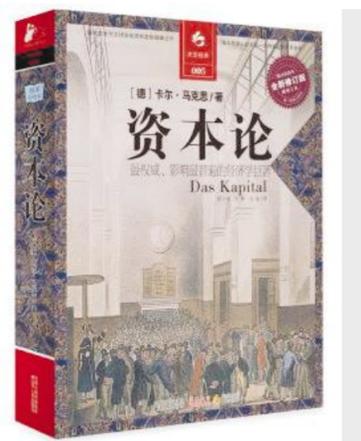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词一般是作为同义词使用的,但是为了把自己的理论与当时流行的各种空想的、改良的社会主义相区别,马克思更多地用“共产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用“自由人联合体”和“共产主义”来表达他对未来社会的设想。虽然这时还没有像《哥达纲领批判》里那样明确地把未来社会分为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但《资本论》中已有关于未来社会阶段划分的思想。

如,在第一卷第一章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分配制度时写道:“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这里所说的“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以及“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本身就包含着共产主义因发展程度不同而产生的阶段区分。

《资本论》把共产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来论述,指出共产主义是优于资本主义的更高级的新的社会制度,是按照历史发展规律必然实现的先进的社会制度。当然,《资本论》中的共产主义还是现存的社会主义,而是作为原理的共产主义。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商品、货币等范畴已不存在,这与当前我国生产力水平不高,还需要利用商品、货币等经济杠杆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有所不同。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经济形态所作的预示及其原理和方法,不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关系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命运,是极其宝贵的理论财富。

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转化为共产主义生产关系

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理解为一个自



然历史过程”,资本主义也是这个自然历史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它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也不是永恒的历史阶段,它只是从小私有制向共产主义公有制的过渡阶段,这是以“铁的必然性”发挥作用的必然趋势。

(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对抗性质必然导致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

《资本论》自始至终贯穿着资本的逻辑。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经济细胞——商品开始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货币“是资本的最初表现形式”。然而,“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的自由工人时,资本才产生。”也就是说,当资本家购买到劳动力商品时,货币才能转化为资本,资本才能产生。于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准确地说是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关系,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中的核心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当资本进入生产过程后,资本表现为物,这些物作为资本增殖的手段进入资本家的生产消费。在生产消费过程中,资本由于消费劳动力而使自身增殖,从而获得剩余价值。所以,资本表面上是物,但实质是一种生产关系,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是资本家对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关系,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是从一开始就生产着这种对抗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

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运动是无休止的。作为资本人格化代表的资本家,要不断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通过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实现资本的不断增加。资本积累“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社会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见,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充分体现了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同样是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

因此,“只有把资本看做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表现,才能谈资本的生产性。但是如果这样来看资本,那么这种关系的历史暂时性质就会立刻显露出来。对这种关系的一般认识是同它的继续不断的存在不相容的,这种关系本身为自己的灭亡创造了手段。”

(二)资本主义矛盾包含着资本主义关系的解体及向社会共同占有生产条件的转化

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蕴藏着其必然的走向。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就在于它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但这种文明作用既始于社会关系的变革,也会终于社会关系的革命性变革,从而为未来新社会的产生创造出各种有利的因素。随着剩余劳动不断转化为资本,剩余劳动的积累就越成为资本家手中的权力。资本家则以资本来量化权力,以公司或国家的形式,共同支配整个社会,控制社会生产。随着资本权力的增长,社会生产条件与实际生产者之间的分离越是增长,资本越是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来控制整个社会生产秩序,统治整个社会。这种权力作为物,作为资本家通过这种权力取得的权力,与社会相对立。资本主义积累的对立性质,使资本主义生产从一开始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巩固,发展成为创造和积累它自身矛盾的手段。

“由资本形成的一般的社会权利和资本家个人对这些社会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会发展得越来越尖锐,并且包含着这种关系的解体,因为它同时包含着生产条件向一般的、共同的、社会生产条件的转化。这种转化是由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发展和实现这种发展的方式所决定的。”当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得不相适应时,共产主义新社会的“一些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必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胎胞里孕育,成熟,并成为“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这种由榨取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堆砌而成的资本的社会权力,并将这种社会权力由劳动者共同拥有和支配。生产条件不再由部分私人所有,而是全社会共同所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不再为私人资本积累,而是作为社会的公共积累,作为历史关系的资产阶级对抗性生产关系将必然导致没有阶级对抗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

(三)代替自由竞争的垄断为整个社会剥夺资本家做好了准备

资本主义内在竞争规律使生产越来越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这种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引起的垄断,最初是“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进而将为整个社会剥夺资本家做好准备。马克思在1860年代就看到了这种曙光。

“在英国,在这个构成整个化学工业的基础的部门,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并且已经最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

“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运用于技术方面,土地被日益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转化为只有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事实正是如此,从19世纪20年代自由竞争的英国首次爆发经济危机,5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首次爆发世界性经济危机,一直到90年代末基本形成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激化,导致苏联和东亚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并表明资本主义的外壳已被炸毁,私有制丧钟已经敲响,剥夺者已被剥夺。这些资料公有制的基础的最终重建都是消费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实现,重建部分消费品的个人所有制。至于苏东欧国家剧变,那只是社会主义波浪式发展的一种曲折性。

(四)资本主义是直接处于实行自觉改造的共产主义社会以前的历史时期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一开始就与劳动条件相异化;从生产的结果看,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随着劳动对资本从形式上的隶属转变为实际隶属,工人越来越成为局部工人,“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在这个直接处于人类社会实行自觉改造以前的历史时期,实际上只是用最大限度地浪费个人发展的办法,来保证和实现人类本身的发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反复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作为劳动的“极端的异化形式”,必然会过渡到自己反面的自主性“联合活动”。随着劳动异化的不断强化,它自身不断地创造和积累解决自身矛盾的条件和力量,这也意味着,只有到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阶段,“解放”一词才具有了实际的社会意义,人类解放才具有直接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建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才能最终消灭异化,才能实现“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后资本主义与前共产主义之间的一个历史时期,是逐步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理想和目标的过渡社会形态。(待续)

当经济学家不再神奇之后:中国需要普及哪些经济学常识?

刘波

不少人曾经以为经济学家懂得经济,但在更深入地了解了经济学之后,发现经济学家也经常处在迷茫之中,连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也对很多基本问题无法达成一致。对于居高不下的贫富差距,不少人也把账算到了经济学家头上,指责他们鼓吹的“新自由主义”要为“权贵资本主义”和“社会堕落”负责。

不少人曾经以为经济学家懂得经济,但在更深入地了解了经济学之后,发现经济学家也经常处在迷茫之中,连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也对很多基本问题无法达成一致。对于居高不下的贫富差距,不少人也把账算到了经济学家头上,指责他们鼓吹的“新自由主义”要为“权贵资本主义”和“社会堕落”负责。

不少人曾经以为经济学家懂得经济,但在更深入地了解了经济学之后,发现经济学家也经常处在迷茫之中,连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也对很多基本问题无法达成一致。对于居高不下的贫富差距,不少人也把账算到了经济学家头上,指责他们鼓吹的“新自由主义”要为“权贵资本主义”和“社会堕落”负责。

近20多年来,经济学家的形象和角色经历了有趣的转变。他们曾经是大众的宠儿,被认为掌握着洞悉天机的特殊能力,能够像魔术师般为国家制造出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造福于万千民众。他们总是出现在聚光灯下,公众有无数的问题需要他们解答,好像他们拥有神秘的水晶球,拥有预知未来的力量。

不仅如此,在学术界,“经济学帝国主义”也侵城掠地。越来越多的其他学科的专家愤怒地发现,经济学家正在用自己的分析方式来处理那些原本由他们垄断的课题。他们控诉经济学思维把一切都变成了冷冰冰的利益分析,甚至数学游戏,但却因为不能熟练使用经济学家挥舞的武器,尤其是模型和数学,而在争论中显得底气不足。

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学家开始遭到愤怒的质问:“为什么你们没有预见危机的到来?为什么你们开的药方总是不见效?为什么增长率和就业至今不能恢复到正常水平?”不少人曾经以为经济学家懂得经济,但在更深入地了解了经济学之后,发现经济学家也经常处在迷茫之中,连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也对很多基本问题无法达成一致。对于居高不下的贫富差距,不少人也把账算到了经济学家头上,指责他们鼓吹的“新自由主义”要为“权贵资本主义”和“社会堕落”负责。连学习经济学的本科生也集体罢课,抗议学校教授的经济学局限于特定的派别,而且脱离实际,成为阁楼里的游戏。很难说,那些曾经受到经济学家“羞辱”的其他学科的专家,没有感受到一丝“复仇”的快感。

在经济学界内部,流行的风潮也在发生转变。1980年代兴起的,以“芝加哥学派”为理论旗帜,以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为政治代表的自由市场主义,在思想市场中遭

到的质疑日益增多。这一思潮主张最小化的政府与最自由的市场,被指责为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总之,经济学家从大功臣变成了替罪羊。凯恩斯主义者重新跃跃欲试。特朗普在美国赢得了大选。他虽然是一个右派,却恐惧移民,恐惧自由贸易,试图用更多的政府干预来挽救就业市场。市场原教旨主义并没有因为右派的重新掌权而得势,反而因为“另类右派”的崛起这种讽刺的反差,而陷入了更严重的形象危机。

难道真的是经济学的错吗?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试图为他的专业辩护。他强调,经济学家往往在公众面前表现得更加“亲市场”、“亲企业”,但专业的经济学家在内部研讨会上通常有更加丰富、差异化的见解,事实上大多数专业经济学家都是深藏于象牙塔里的学者,不愿轻易介入公共讨论,即使介入也因其治学极为严谨、细致,而不会给出简单的,我们经常从电视评论员那里看到的流行的俗见。真正的经济学家和推销特定意识形态的“政策企业家”是截然不同的。

更重要的是,经济学是多种模型的集合,经济学家不止使用一类模型。虽然常用的供求关系模型能解决很多问题,但它也不是普适性的。罗德里克写道:“一般经济学理论不过是反映纷繁复杂的经验现象的脚手架,是帮助我们梳理思路的一种方式,而不是而且至今仍在不断演化的分析框架,这些框架对世界的运行方式有不同的解读,对公共政策有多种多样的意义。当经济学家误入歧途,比如对任何问题都推销同一种解决方案的时候,这并不说明他们在遵守本专业的规范,而恰恰反映出他们违背了经济学对灵活、开放的要求。”

可以说,《经济学规则》一书是一本专业经济学家写的,给外部人做的本学科的“自我介

绍”,让人们理解经济学的优势与局限。但对经济学家来说,这又是一本经济学“使用手册”,一本经济学方法论著作,指导经济学研究者跳出具体的经济学问题,而从高处俯瞰,学会如何宏观地理解和运用经济学。罗德里克建议,经济学家应该同时在头脑里保持多种模型,并熟悉筛选模型的技艺,知道如何根据具体的情况自如地转化他们应用的模型。

如果经济学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推销“更小的政府、更少的监管”的万灵药,他们的确会堕落成为富人和大企业的说客。毕竟,即使是“看不见的手”的提出者,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也重视政府对于保持经济正常运转的作用,承认一定程度的劳工保护的必要性,并强调除了理性自利的考虑之外,人还必须要道德情操。斯密对于市场经济增进繁荣和促进自由的作用倍加推崇,但他并不对市场怀有宗教式的崇拜,更不会主张为追求经济自由而放弃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

如今,一些经济学家一方面把亚当·斯密对于市场作用的洞见教条化,对于复杂的、多样化的问题提供简单的、统一的药方,另一方面与大企业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公共政策议题上偏袒性地替企业说话。罗德里克批判了这些错误,指出这是固执的偏见,并要对经济学家在美国形象的恶化负一定的责任。但也要看到,经济学的批评者也会犯很多偏执的错误,如果他们把经济学贬得一文不值,这种过错比那些滥用经济学的人还要大。经济学的确改变了这个世界,这不容否认。例如,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的市场化改革,让无数人实现了温饱,逃离了数千年所未逃离的“贫困陷阱”,经济学知识的积累和传播对此功不可没。除此之外,经济学知识的运用促进了减贫事业,提高了医疗效率,改善了城市交通,简单的经济学常识得到决策者的理解和应用,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罗德里克强调,许多外界对经济学的批评并没有抓住要害。比如,一些人误解数学在经济学中的普遍应用,以为使用数学是为了把事情复杂化,或者宣称经济学代表了更高的真理,但事实上经济学家使用数学只是为了思考和论证的清晰、连贯,与追求荣誉无关。如果经济学家能把他们的思想以清晰的数学形式表达出来,其他经济学家就可以对其进行讨论和验证,这为经济学提供了一种共通的规范性语言,从而可实现有效知识的积累。其他学科不使用数学,很可能导致各执一词与无可弥合的分歧,以及一些人用故弄玄虚的语言来制造高深的假象,把混乱装成深刻,而这是经济学家所无法忍受的。

化因素。罗德里克指出,这些批评也许是合理的,但经济学家也可以用本专业的方式来回应批评,如设计出具体的模型来考虑文化因素对经济表现的影响。很多看似与经济学无关的问题,都可以用经济学的方式来解答,这非但不是对经济学的贬低,反而说明了经济学的强大。总之,罗德里克非常公正,既对不少经济学家常犯的错误提出了批评,也捍卫了经济学的尊严。

其实,如果不是过于自卑和保守,其他学科的学者通常也会承认,使用模型、数学分析等经济学方式来研究本学科的课题,的确对其起到了丰富与发展的作用。同时,经济学在“侵入”其他学科的同时,其自身也得到了丰富,介入这些新的领域迫使经济学家重新审视自己的本行,并获得全新的理解,变得更加头脑开放,更有创造力。其实,划学科本来就是为了让我们的时代更好地理解现实而做的设计,倘若这种划分反过来禁锢我们的头脑,各学科画地自限,因循守旧,那就迷失了它的本意,也是有害的。

中国需要普及经济学常识,但或许也需要以罗德里克这样的通俗达理、循循善诱的方式来进行。“真诚对待本学科的经济学家必然是谦逊的”,罗德里克写道。其实,经济学家需要在公众面前保持谦卑和开放,而不是自以为真地在胸,居高临下地斥责和宣讲。“经济学为应对我们时代的重大公共问题提供了很多跳板和分析工具。但它并未提供权威的、普适的答案。源自经济学界自身的结论,必须与伦理、政治或实践方面的价值观、判断、评估结合起来。归根结底,这与经济学这个学科没有多大关系,而是完全与现实有关。”我们可以期待,只要经济学家保持谦逊的态度,继续发挥其价值,经济学必将实现它与社会、公众的和解,并释放出更为辉煌的光芒。